



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專輯

古典文獻研究

(第十五輯)

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

GuDian WenXian
YanJiu

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專輯

古典文獻研究

(第十五輯)

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

GuDian WenXian
YanJiu

國家“985工程”三期經費資助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”
(10&ZD130) 階段性成果

鳳凰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（C I P）數據

古典文獻研究. 第十五輯 / 程章燦主編. -- 南京：
鳳凰出版社, 2012.11
ISBN 978-7-5506-1618-9

I. ①古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古文獻學—中國—叢刊
IV. ①G256.1-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2)第252614號

書名 古典文獻研究(第十五輯)
編者 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專輯
責任編輯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
林日波
出版發行 凤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
發行部電話 025-83223462
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, 郵編: 210009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, 郵編: 210009
出版社網址 <http://www.fhcbs.com>
經銷 凤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印刷 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
南京浦口大橋北路京新村546號, 郵編: 210031
開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張 20.25
字數 583千字
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標準書號 ISBN 978-7-5506-1618-9
定價 68.00圓
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 電話: 025-58849828)

主 編 程章燦

編輯委員會（按姓名音序排列）

曹 虹	陳尚君	陳正宏
程章燦	叢文俊	杜澤遜
郭英德	姜小青	劉玉才
劉躍進	武秀成	徐 俊
徐有富	張湧泉	趙生群

執行編輯 趙 益

前 記

《古典文獻研究》第十五輯是“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”專輯。

近兩年來，我們在編輯《古典文獻研究》時，嘗試採取一種新的策略，即圍繞某一個主題，集中刊發一批論文。例如，《古典文獻研究》第十四輯就是“《文選》學”專輯，其中又特別集中刊發了一組歐美與日本學者有關《文選》學的研究論文。我們期望通過這樣一種方式，相對集中地展示學界同行在這一領域的最新學術探索，更加切實地推動學術進步。同時，我們也期望這樣的專輯，由於其主題集中，能夠凝聚思考，而更容易引起相關領域學者的關注和重視。

說實在的，這並不算特別新異的做法，不少學術叢刊早已揚鞭先著，並有了一些成功的經驗。當然，這不是說，我們也這樣做就沒有我們自己的考慮。本輯以“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”為主題，這一選擇與設計，既表明了我們當下的學術追求，也是我們向學術界發出的一個倡議。關於印刷文化和書史的研究，是近幾十年在歐美學術界發展起來的一個新的學術領域，進入新世紀以來，這一學術領域迅速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關注，並成為歷史文化研究領域一個新的熱點。我們認為，在這一時空背景下，規劃並重視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，在學術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。一方面，印刷是古代中國書籍最重要的生產方式之一，而

書籍則是中國古代文獻中最核心、最重要的部分。書史研究不僅與印刷文化密切相關，而且也是古代文獻文化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。因此，研究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，既可以挹取歐美學術資源，借鑒其學術成果，又可以透過相關議題，創立學術平臺，與歐美同行展開更直接、更便捷的對話。另一方面，中國古代文獻形式多種多樣，無論就其物質形態與生產方式，還是就其內在體系與傳播途徑來看，都大大超出歐美書籍史和印刷文化的範疇。古典文獻學諸傳統學科，如版本、目錄、校勘及典藏等，雖然其要旨在於歷史描述和實用指引，但其中亦多涉及古代文獻文化之內容。顯然，研究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，需要接續中國傳統學術之源頭活水，才能推陳出新。總之，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內涵豐富，可以溝通古今，聯繫中外，是一個很有學術前景的領域，我們需要的是開闊視野，開拓創新。

令我們感到欣幸的是，我們的倡議得到了學界同行的熱烈回應。學界同行積極供稿，這既是對我們的支持，也使我們倍受鼓舞。即使從最後採用的稿件來看，內容也是相當豐富的。為此，我們設置了古代文獻與社會文化、寫本時代的文獻與文化、宋元明時期的出版與文化、域外漢籍與東亞文化等欄目。這幾個欄目雖然不足以涵蓋古代文獻文化史的全部，却也粗略反映了我們所規劃的古代文獻文化史的基本框架。我想在這裏特別感謝美國哈佛大學宇文所安(Stephen Owen)教授、田曉菲教授、布朗大學包筠雅教授(Cynthia Brokaw)對我們的支持。包筠雅教授近年來在書史研究方面成就相當突出。她貢獻給本輯的論文，是她根據今年6月12日在南京大學的講演稿修訂而成的，論文精要概述了她的新著《文化中的商業：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四堡書業》(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，2007年)的要義。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何朝暉教授，近年來著力研究中國古代出版史、書籍文化史，並翻譯出版了

美國學者周紹明教授的《書籍的社會史：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、英國學者戴維·芬克爾斯坦和阿利斯泰爾·麥克利里著《書史導論》（商務印書館，2012年）等專著。感謝他們為本輯貢獻了新作《山人與出版：俞安期生平、著述與刻書活動考》。

周勛初先生積數十年研究之心得，撰成《文心雕龍解析》，即將由鳳凰出版社出版，先將此書《前言》交本刊發表。將近三十年前，我曾聽過周先生講授的《文心雕龍》課，至今還保留着那時的講義，就是《文心雕龍解析》一書的雛形，其後又陸續讀到周先生關於《文心雕龍》的諸多精彩論述。此書之撰作產生過程，亦可作為文獻文化史上的一個生動案例，作為見證者，我願意在此記上一筆，並向讀者鄭重推薦此書。

程章燦

2012年9月

目 次

特稿

《文心雕龍解析》前言 / 周勛初 (1)

古代文獻與社會文化

經典闡發與政治術數

——《洪範五行傳》考論 / 徐興無 (28)

純文獻和文化文獻

——文化情境中的易安詞 / 俞士玲 (63)

中國書籍社會史：四堡書業與清代書籍文化 / 包筠雅 撰 葉蕾
蕾等 譯 (83)

晚清官書局與近代文獻傳承 / 張宗友 (106)

清代女性著述出版途徑考 / 張聆雨 (146)

寫本時代的文獻與文化

秦漢數學類書籍與“以吏為師”

——以張家山漢簡《算數書》為中心 / 吳朝陽 (168)

《切韻》的編纂與隋初大一統的文化建設 / 楊曉斌 (189)

魏晉南北朝校書考述 / 胡大雷 (206)

互文的歷史：重讀《五柳先生傳》 / 于 湖 (222)

唐代的手抄本遺產：以文學為例 / 宇文所安 撰 卞東波 許曉穎 譯 (236)

誤置：一位中古詩人別集的三個清抄本 / 田曉菲 撰 卞東波 葉楊曦 譯 (267)

宋元明時期的出版與文化

《錦繡萬花谷》續書與《初學記》

——南宋書坊“纂”書方式管窺 / 李更 (288)

試論宋元時期閩中坊刻醫書的編刻特點

——以《新編類要圖注本草》及其傳刻本為中心 / 陳曉蘭 (320)

《事林廣記》源流考 / 王珂 (342)

明代公案小說與訟師秘本之關係 / 陳麗君 (353)

山人與出版：俞安期生平、著述與刻書活動考 / 何朝暉 (369)

何良俊藏書、鈔書與刻書考 / 胡海英 (394)

域外漢籍與東亞文化

歐陽修《廬山高》、《醉翁亭記》在朝鮮漢文學中的追摹與變形 / 卞東波 (409)

論朝鮮文人金堉的集杜詩 / 崔哲元 (437)

和刻本古逸書提要十七種 / 金程宇 (448)

校勘學研究

文字訛誤之迹與古文獻校改 / 武秀成 (462)

文獻考證與學術叢札

左思《三都賦》與魏晉史學 / 唐志遠 (472)

六朝石刻誤讀舉正 / 梁春勝 (490)

《禮記正義》據皇侃《禮記義疏》刪理成書考述 / 張帥丁鼎 (500)

《陋室銘》作者祛疑 / 王鶴李曉麗 (514)

- 《冷齋夜話》版本考 / 查雪巾 (533)
江昱《山中白雲詞疏證》析論 / 夏志穎 (557)
吳敬梓家世新探
——讀吳國縉《世書堂稿》 / 鄭志良 (569)
讀《文選》小札 / 顧 農 (590)
《初學記》“打撻”條釋疑 / 范春義 (593)
《新唐書·宰相表》校誤 / 李軼倫 (601)

書評

- 點校本《真誥》述評
——兼論魏晉南北朝道經的整理 / 周作明 (611)
日蒙古抄本與古文獻的學術價值
——讀《漢籍東漸及日蒙古文獻論考稿》 / 金程宇 (624)
- 《古典文獻研究》徵稿啓事 (636)
《古典文獻研究》稿件書寫格式 (638)

古典文獻研究(第十五輯)

2012年7月

《文心雕龍解析》前言

周勛初

劉勰的生平

閱讀《文心雕龍》，首先得對作者劉勰的歷史有所瞭解。

劉勰的個人歷史很簡單。祇有《梁書》的《文學傳》中有記載；《南史》的《文學傳》中也有同樣的一篇傳記，祇是略有出入就是了^①。

進入20世紀之後，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空前繁榮，《文心雕龍》是古代唯一的一部體系完整的文論專著，這就吸引了衆多學者的關注。上一世紀60年代，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分裂，中國強調獨立自主，從而着力宣揚傳統文化，《文心》開始受到重視。八九十年代，更是名家雲集，著述繁富，其間產生了許多年表與年譜，對劉勰生平的每一個環節都進行了反復的推敲。初學者讀過正史中的傳記之後，進一步閱讀各家論述，或許會感到頭緒紛繁，難於把握。牟世金撰《劉勰年譜匯考》，集合

^① 參看楊明照《梁書劉勰傳箋注》，載《增訂文心雕龍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2000年。

諸家之說，申述個人考辨所得，值得參考^①。穆克宏撰《劉勰年譜》，篇幅適中，立說謹慎，可以先讀^②。

建國初期，人們研究歷史人物時，首先關注其出身，因此對於劉勰到底出身於庶族還是士族，是低級士族還是高級士族，有人進行了探討^③。隨着歷史學界對此深入研究，問題趨於明朗^④。《梁書》本傳說：“祖靈真，宋司空秀之弟也。父尚，越騎校尉。”說明劉勰出身於官宦之家。而據《宋書·劉秀之傳》的記載，他是劉宋開國君主劉裕最為倚重的大臣劉穆之的從兄之子，可以認為劉勰出身於一個顯貴家族。有的研究者則注意到，《南史》上已把“祖靈真，宋司空秀之弟也”一句刪去了。何以如此，情況確是很複雜，值得進一步探討。或許劉勰一系為了抬高自家聲價，與劉秀之一族硬拉上關係。六朝之時常見這種族譜作假之事。祇是到了 70 年代，江蘇鎮江地區句容縣發現了一方劉岱墓誌，上面記載着劉氏的先世，與靈真情況相同，可證《宋書》上的記載是可信的。劉勰應當出身於劉穆之、秀之等同一家族。五胡之亂，東莞劉氏由徐州東莞郡莒縣（今山東莒縣）遷至南方僑置的南徐州治所京口（今江蘇鎮江），雖非最高層階的士族，却也高官多見，屬於層次稍低的士族。祇是他與家族中人的關係似乎並不親密，父親又早歿，因無人援

^① 卞世金《劉勰年譜匯考》，巴蜀書社，1988 年。張少康《劉勰及其〈文心雕龍〉》對劉氏生平續有考證，且對牟著有所訂正，見第一章《劉勰的家世、生平和思想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0 年。

^② 穆克宏《劉勰年譜》，原載《福建師範大學學報》1986 年第 2 期，為《劉勰生平述略》之附錄，後收入《文心雕龍研究》論文集中，驚江出版社，2002 年。關於《滅惑論》的寫作，作者認為當在齊代。

^③ 參看周振甫主編《文心雕龍辭典》中“各家爭論說介紹”內“劉勰家世”部分，中華書局，1996 年；張少康等著《文心雕龍研究史》第四章《當代的〈文心雕龍〉研究（下）》“關於劉勰的身世研究”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1 年。

^④ 唐長孺對魏晉南北朝的社會結構有很深入的分析，可參看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》中的前面部分。他在《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》中的《讀史劄記》中對“素族”、“寒士”的分析，亦可參看。二書分列《唐長孺文集》第四卷、第二卷，中華書局，2011 年。

助，也就陷於窘迫了。

《梁書》本傳說劉勰“家貧不婚娶”，何以如此，大家看法也不一致。有人認為士庶天隔，他家窮了，同一階層中人不肯把女兒許配給他，又不好到其他階層中去物色，祇能陷於“不婚娶”的困境。有人則認為他已皈心佛教，故而不婚。這種事情很難說清楚。今日人們對這類問題作出的分析，大都是基於個人對當時社會的理解，認為情理上必然如此而作出的判斷。但人在社會上存身，情況至為複雜，要想根據歷史上的個別材料進行分析得出大家普遍認可的結論，很難。我們祇能說，劉勰因父親早死，家道中落，在婚姻問題上高不成低不就，也就難以解決。況且他在二十多歲時即已入居定林寺，置身宗教場所，周圍全是“不婚娶”之人，也就會淡然置之了。

看來劉勰思想上一直存在着入世與出世的矛盾。他對佛教的信仰，可謂始終如一。除《文心雕龍》一書外，他還留下了《滅惑論》與《剗山石城寺造像碑》二文^①。據近人考證，《滅惑論》的寫作當在齊代，是為批判道教中人提出的《三破論》而寫作的。所謂“三破”，即“入國而破國”，“入家而破家”，“入身而破身”。僧徒剃掉父母生下的毛髮，又不營家室，違背中國傳統，因此《三破論》中攻擊佛教徒的不婚娶有“絕種之罪”。劉勰以為佛教的戒令自有其理由：“妻者愛累，髮者形飾”，“愛累傷神，形飾乖道，所以澄神滅愛，修道棄飾”。由此可見，劉勰對佛家教理也是信從的。他入定林寺後，一方面撰寫《文心雕龍》，奉儒家思想為正宗，評判古今文章得失；一方面宣揚佛教教理，維護佛家宗旨。他在進入梁代王室系統的文士隊伍之後，一直堅持二者並重的立場，祇是隨着處境與評論對象的不同而各有側重罷了。例如他在寫作《文心雕龍》和在朝廷任職時，儒家思想自然上升至主導地位，而在寫作《滅惑論》和

^① 《滅惑論》載梁釋僧祐編《弘明集》卷八、《四部叢刊》本。《剗山石城寺造像碑》全稱《梁建安王造剗山石城寺石像碑》，載宋孔延之編《會稽掇英總集》卷一六，楊明照從清道光元年山陰杜氏刊本抉出，首載於《文心雕龍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（上海編輯所），1959年。此碑殘文見《藝文類聚》卷七六，題作《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》。

各種有關佛教的碑誌時，也就純以信徒的身份出現了。

看來劉勰的家世對他深有影響。其上代均重建功立業，父親早歿，未能升至要位，然位列四品，已經顯示前途有望，說不定日後也能像劉穆之、劉秀之那樣光耀史冊。這種家族中的子弟，常是不甘沉淪而欲有所作為。《文心雕龍·程器》篇中說：“是以君子藏器，待時而動。發揮事業，固宜蓄素以弸中，散采以彪外，楩楠其質，豫章其幹。摛文必在緯軍國，負重必在任棟樑；窮則獨善以垂文，達則奉時以騁績。若此文人，應《梓材》之士矣。”這一番話，當是他本人有感而發的自白。他既不甘於“獨善以垂文”，希望能有“奉時以騁績”的機遇，從他進入蕭氏王室之後的經歷來看，也曾作出過努力，然而並不如願。

《梁書》本傳說，“天監初，起家奉朝請。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，遷車騎倉曹參軍。出為太末令，政有清績。除仁威南康王記室，兼東宮通事舍人”，後“遷步兵校尉，兼舍人如故”。這些任命中的記室之職，擔任的是秘書一類職務，應是看重他善於文學的緣故。王室僚屬中的秘書類官員每向軍幕中的職務發展，劉勰擔任的車騎倉曹參軍、步兵校尉等職，與其上代擔任的軍中職務類同，但他未能由此“負重”而“任棟樑”，最後還是祇能“獨善以垂文”而命世。

看來蕭氏一門都很看重劉勰的文才。上一代人，臨川王蕭宏引為記室，建安王蕭偉請他為佛寺撰寫碑文。下一代人，南康王蕭續又引之為記室，昭明太子蕭統則讓他到東宮兼職，且歷時頗久，“深愛接之”，而從傳世文獻來看，湘東王蕭繹對他也很欣賞。《金樓子·立言》篇曰：

管仲有言：“無翼而飛者，聲也；無根而固者，情也。然則聲不假翼，其飛甚易；情不待根，其固非難。”以之垂文，可不慎歟！古來文士，異世爭驅，而慮動難固，鮮無瑕病。陳思之文，群才之雋也。《武帝誄》云“尊靈永蟄”，《明帝頌》云“聖體浮輕”，“浮輕”有似於蝴蝶，“永蟄”可擬於昆蟲，施之尊極，不其嗤乎？^①

^① 參看許逸民《金樓子校箋》卷四《立言篇第九下》，中華書局，2011年。

這一段話，引自《文心雕龍·指瑕》，說明蕭統兄弟都很重視劉勰的文學見解，蕭綱、蕭繹的文字中都有暗合《文心》的地方。

不過劉勰思想中的宗教成分還是太濃烈了。他在《文心雕龍》中盡力避免佛家教義的羼入，將之定格為宣揚儒家宗旨的一部學術著作，亦即“入道見志”的一部子書，但他在《論說》篇中縱論當前學界紛爭時，也就提出“般若”之說來壓倒“有、無”之辨了。這也說明，劉勰即使是在宣揚儒家義理時，還是不能忘情於佛理的宣揚。

因此，一當梁武帝蕭衍於天監十六年詔令七廟饗祭改用蔬果之後，劉勰隨即上表陳請二郊的祭禮應與宗廟一致，改用蔬果，取代犧牲。此舉得到了朝廷的認可，於此也可看到劉勰篤信佛家教義的態度前後一致，而這與蕭氏王室中人的儒釋相容的作風也一致。

正由於這種思路上的一致，劉勰常是來回於王室與寺院之間。天監七八年時，他受王家之命，返回定林寺，擔任佛經方面的整理工作。梁武帝“選才學道俗釋僧智、僧晃、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，抄一切經論，以類相從，凡八十(八)卷”^①。一當僧祐去世，梁武帝蕭衍又立即想到讓劉勰回到定林寺去完成經藏編目的任務了。

僧祐在蕭氏皇室中享有至為崇高的聲譽。梁武帝經常請他到宮中講經，遇到佛學上的問題，佛事方面的處理，都要聽取他的意見。僧祐晚年，患腳疾，行動不便，梁武帝讓他乘輿入內殿為六宮嬪妃受戒。臨川王蕭宏、平南王蕭偉、永康定公主均盡師資之禮。劉勰進入蕭梁皇室文士隊伍，得到上下兩代的接納，應當與僧祐的引見有關。即以前時封為建安王的蕭偉來說，分封的境內剡縣發現了靈異之事，上報之後，朝廷隨即命僧祐營造大佛，且由劉勰撰寫碑文，即可見其因緣。蕭統之母丁貴嬪亦崇信佛教，師奉僧祐，劉勰受到昭明太子的愛接，亦當與這層因緣有關^②。

① 見唐釋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卷五《梁揚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》，大正新修《大藏經》本，第五十冊，史傳部二。

② 參看梁釋慧皎撰，湯用彤校注，湯一玄整理《高僧傳》卷一一《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》，中華書局，1992年。

劉勰重回定林寺，宗教方面的情緒越發強烈，證功已畢，遂“燔鬢髮以自誓”，“啓求出家”，可知其時他為宗教熱忱所驅使，已陷狂熱狀態，於是他在人生的起點定林寺中以一名僧人的身份度過了晚年。

劉勰研究基本史料之分析

我對劉勰的生平作了概括性的介紹，便於讀者對此先有一些基本的認識，而不致多歧亡羊，無所適從。祇是想要瞭解得深入，則還得作進一步的分析。

首先得對《梁書》和《南史》的性質作些介紹。

大家知道，《南史》是抄錄宋、齊、梁、陳幾朝史書而成的，又進行了大幅度的刪節，增加了許多新的史料。從刪節而言，或是認為無關緊要，或者祇是為了減少篇幅。在劉勰傳中刪去有關劉秀之的記載，當是以為此事無妨大局，而它沒有在劉勰傳中增加一絲新的材料，却是耐人尋味。

李延壽在《北史·序傳》中自云，他“從此八代正史外，更勘雜史，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，皆以編入”，說明他曾在南朝的四種正史記載之外，補入了大量史料。對我們研究文史的人來說，《南史》中增入的“雜史”，很多屬於筆記小說中的記載，尤應重視，因為內中常有涵義豐富的一些奇聞軼事。例如《江淹傳》中，就記有他夢見張協向他索回一匹錦與郭璞向他索回五色筆之事，這些都是傳頌千古的文壇嘉話，而“江郎才盡”這一典故，也一直為後人所慣用。

《梁書·五王列傳》中，記叙王室中人的事迹多避忌，不能窺知究竟。《南史·梁宗室列傳》上、下中則補入了很多珍貴的材料，可以說明劉勰出仕之後的那些事主為何等人物，從而可以逆探其時的處境。

《南史·昭明太子統傳》中還記載，蕭統葬母時為了風水方面的原因，埋蟬鵝厭禱而失歡於父，終至慚憤而卒。這事與劉勰晚年的去向也有關係，却不在《梁書》中的記載。可知《南史》中所增補的史料，確是值得後人高度重視。

這就說明，研治魏晉南北朝文史的人，如將南朝幾部正史與《南史》並讀，自可從中得到啓悟。

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卷一〇有《南史增刪梁書處》一條，曰：

《南史》增《梁書》事迹最多。李延壽專以博采見長，正史所有文詞必刪汰之，事迹必櫟括之，以歸簡淨，而於正史所無者，凡瑣言碎事，新奇可喜之迹，無不補綴入卷。而《梁書》本據國史舊文，有關係則書，無關係則不書，即有關係而其中不無忌諱，亦即隱而不書，故行墨最簡，遂覺《南史》所增益多也。^①

呂思勉在介紹齊代蕭子良之敗時，以王融之死為例，縱論《南史》等書之史例，文曰：

《十七史商榷》曰：“融乃處分至無不從命一段，《齊書》所無，《南史》所添也。描摹情事，頗覺如繪。但李延壽既知此，則下文西昌侯固爭不得一句，亦《齊書》所無，延壽何意又添此一句乎？”案此可見古人史例，凡衆說皆網羅之，雖相矛盾，亦不刊落，以待讀者之自參。因當時行文通例如此，故不必更加解釋。後人動以矛盾駁雜議古人，實非也。^②

由此可見，李延壽編纂《南史》時廣采異說，即使內容矛盾的材料也盡行納入，而他所作的刪節，却有不盡妥當之處。除趙翼外，王鳴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、錢大昕在《廿二史考異》中均曾多次指責其學識方面之不足，這些亦應引起後人注意。《南史》中對劉勰史實的處理，也是在不該刪節之處作了刪節，大家期待他有所加入時却沒有任何增添。不過

^① 參看王樹民《廿二史劄記校證》卷一〇《南史增刪梁書處》、《南史增梁書有關係處》及卷一一《南史增梁書瑣言碎語》等條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。

^② 呂思勉《兩晉南北朝史》上冊第十章《齊梁興亡》第二節《鬱林王之敗》，開明書店，1948年。